

一种转型理论

[文 / Ivan Szelenyi]

在这篇短评中，我将对孙立平富有启发性的文章，“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做些补充而不是批评。我对孙的文章大都同意，我不想详细讨论我们之间多数是在术语使用上的分歧，而想强调我们在分析上的共同点。

本评论的目的有三点：

1) 我同意孙立平所说的，迄今为止中国的转型过程是独特的，但我相信，对东欧（指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和中欧（指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在共产主义解体以后各自进入的不同路径加以区分是同样重要的。^①根据我早先的工作（Eyal et al., 1998; King and Szelenyi, 2005 and 2006），我认为后社会主义转型有三条、而不是两条演变路径。

2) 但是，受 1990 年代后期以来的众多事件的启发，我要对我早先的转型理论做些修正。我将提供最近十来年里这些路径出现某些趋同的证据。这是一个自我批评，也是与孙立平的友好对话。

3) 孙立平在文章结论中倡导一种实践社会学。他建议关注普通民众而不是精英的生存策略。我理解他的立场，但我要争论的是，在世界的哪个部分和历史的什么关头，历史是由阶级斗争还是由阶级内部不同精英集团之间的斗争所推动的，

是一个经验问题。

后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 从社会主义趋同到分岔的转型策略

社会主义时期的趋同

在 1948~1949 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上都有明显的趋同势头。

如孙立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现代化的独特战略，我要补充的是，一种特别强调加速工业化的战略。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这一战略对欠发达经济有利。捷克斯洛伐克（或匈牙利和波兰），由于已经相当工业化了，它们在社会主义第一阶段的经济表现就不如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后者在进入社会主义前基本是农业经济。中国的经济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政策错误前成长迅速。因此，各国在进入社会主义时，初始的发展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

在社会主义时期各国的制度安排也趋于相同。甚至中国也采用了苏联模式（Brugger, 1976），在苏联红军占领后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欧洲国家则严格照抄了苏联模式。

当然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的这种趋同决不是完全的。如孙立平正确地指出的，中国和苏联的集体化农业有着极大的差别。即使中欧的农业合作社也与苏联的集体农庄不同，而中国的人民公社与上述两者的合作化形式又大异其趣。有些不同是由长时段的原因造成的（如俄国的村社，中国的村庄，及中欧的大庄园都影响了各自的社会主义农业组织）。由于与苏联的竞争或对抗（如1953年后的中国，或1948年后的南斯拉夫）而形成的不同的国家政策也是各国差异的原因。但是，从相同的发展水平和社会及经济组织模式的惊人相似来看，社会主义的支配特征是趋同的。所有这些国家都是一党执政，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为正统，所有国家都出于实际的理由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都是以再分配或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

后社会主义时代早期经济成长的分岔趋势

当上述国家从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转变时，它们重新开始分岔：各个主要历史区域——东亚，东欧和中欧——取得了不同的经济成长速度，并发展出相当不同的制度。

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陷于停滞，中国则在1978年后开始改革，并经历了基本上持续的快速成长。^②当1989~1991年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以后，这个趋势强化了，所有欧洲的前社会主义国家都陷入了巨大的转型危机（Kornai, 1994），而中国的经济则继续成长。

就经济成长而言，1990年代即使对欧洲后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分岔明显的十年。最初几年，欧洲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都直线下降；中欧的经济在1995年跌到谷底。不过，在1990年代的下半期，这个地区的经济成长迅速，到2000年完全恢复到转型前的水平。东欧的经济和社会衰退在开头几年得到一定的控制，但衰退拖得更长久，而危

机也更深刻。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里，东欧和中欧的经济成长曲线截然不同。

走出社会主义的三条路径

三个世界历史区域不仅在经济动力上，而且在制度上再次开始分道扬镳。

（1）中国道路。东亚或中国的道路可以表述为两个互补的（如果不是矛盾的）特征。一方面，中国的后社会主义转型显然是“自下而上的。”改革始于农村（和农业）的集体所有制的解体和家庭企业的重建（Sachs, 2005）。结果，在改革的早期，如孙立平也指出的，“市场转型”的主要受益者是普通民众，即“直接生产者”，特别是农民（Nee, 1989; Szelenyi and Kostello, 1996）。市场改革对城市（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影响要晚得多，一开始只对小型私营企业开放了一些新的空间。即使在为吸引国外投资而创办的新的经济特区，多年来，在那里开办企业的主要是相对小的投资者，常常是海外华人（Sachs, 2005）。另一方面，与欧洲不同，中国的转型是在发展导向的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领导下进行的。在转型的前二十年，在城市经济中公有企业居于主导，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并追求保护主义的目标。如果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初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话，可以说它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其中，国家/共产党是各种社会阶级和社会制度中的关键的平衡力量。中国的发展是“自下而上”与国家主导相结合。

如孙立平所指出的，向市场资本主义转型在前苏联及其东欧的卫星国要剧烈得多——这要归结于共产党政治权威的突然丧失。与中国形成反差的是，在欧洲的前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是“自上而下”建立的。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转变不是来自于发展导向的国家；相反，它是被政治和文化精英的各个派别推动和利用的。在前苏联及其卫星国，向资本主义转型开始于国有企业的私有

化,这给精英们提供了各种机会来将他们原来的特权转变为新的特权,或者,如果他们以前没有特权的话,则让他们为自己攫取特权。

(2) 东欧的新家长制。如我所曾指出的,自上而下的后社会主义的欧洲资本主义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形式。在某些国家——特别是俄罗斯——私有化的主要机制是经理层收购,其结果通常是企业经理人员,甚至偶尔包括前共产党官员,成为新的企业主。我把这称之为“制造资本家却没有资本主义”,因为至少在早期阶段,即直到1990年代中期,产权转移的速度超过了市场制度发育的程度。结果,在俄罗斯,一个新的资本家阶级几乎是瞬间就得以形成,但以物易物仍旧是一种主要的交易手段(Burawoy, 1996; Burawoy, 2001a; Gustafson, 1999; Woodruff, 1999)。由于社会主义的世袭的或家长制权威生存了下来,一些人把这种形式叫做“新家长制资本主义”(Garcelon, 2005)。

(3) 中欧的新自由主义。中欧经济体制的变化比中国和东欧更快、更激进,也更加一以贯之。公有制迅速瓦解了,对经济,价格,外贸的管制转眼之间取消了。这些新资本主义体制甚至比英国、美国这些被视为新自由主义原型的核心国家更符合新自由主义版本的资本主义制度。然而,在中欧国家产权仍旧不太明晰。经理人员——无论是从旧体制留用的还是新聘用的——通常行使决策权,但没有成为私有业主。我把这种体制叫做“推行资本主义但没有资本家”。虽然自从1989年私有化就在中欧开始了,一个资本家“阶级”在形成——但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主要是通过外国投资者收购来进行的(King, 2000)。因此,“没有资本家”指的是国内“大资产阶级”的形成相对缓慢,而不是说资本家们本身是缺席的。外国直接投资,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领导着这个转型。因此,中欧“路径”的另一个表述是“自外而内”地推行资本主义

(King and Szelenyi, 2005),这创造了一个比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都更加全球化的区域,至少在全球化时代的发达地区是如此。

在过去的十年里各国的发展是否证明这个多重路径的理论呢?自2000年以来在后共产主义世界中,可以看到在某些方面显著的趋同,但我要争论的是,在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里,仍旧存在着某些重要的差别。^③

在巩固市场经济中 趋同的前景和限度

在1999~2000年前后,后社会主义的早期分岔趋势改变了。多数中欧国家的增长显著放缓,而俄罗斯开始起飞。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几年,俄罗斯经济表现每年都超越匈牙利和波兰,其增长率接近中国。在转型的第一个十年东欧和中欧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开始缩小。

到1990年代的下半期,各国经济体制也开始趋同。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国开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Sachs, 2005),并对跨国公司开放。我对中国“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的概括,对“第一波改革”最恰当,即1989年以前的那一个时期,对1990年代还可算恰当,但对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可能就完全不恰当了。政治资本主义也在潜入中国。中国的权势精英(nomenklatura)从乡镇企业中学会了如何从市场转型中获利,虽然中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比俄罗斯要缓慢,但受益者却是相同的:共产党的官员、前官员,以及他们的子女和受庇护者(Walder, 1996, 2003)。

在后社会主义欧洲的两个世界中同样可以看到制度上的趋同。中欧不再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一个新的有产的民族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他们中许多人来自于前社会主义企业中的管理阶层,而另一些人则是通过其它各种途径,一般是在

市场竞争中致富的。中欧国家现在是欧盟的成员，面临着强大的压力要它们遵循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实践和制度。

俄罗斯同样展示了向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趋同的信号。市场制度更明确地建立起来——俄罗斯已不再是“有资本家但没有资本主义”的情况了。但是我们看到在新家长制统治精英和某些财富寡头之间围绕着新近获得的产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普京政府甚至威胁要将某些石油工业重新国有化，这些企业是被前共产党官员攫取后变成私人财产的。但是这主要是场政治斗争。新家长制政治精英反对试图展示政治抱负的财富寡头。这是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而不是反对私有制的斗争。然而，以物易物的经济衰退了，市场制度牢固地建立起来，财富寡头已经准备好同政府就税收达成协议，并认识到如果他们希望吸引更多的外资和技术的话，他们需要更确定的商业环境。

我十年前就完成了《推行资本主义但没有资本家》的书稿，这是我第一次全面阐述关于三种后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在写这篇评论时（2007年夏），我有理由在区分后社会主义转型的不同路径时更加谨慎。中国可能并不像我在十年前所相信的那样、或像孙立平这篇文章所指出的那样例外。

但是我不想把我的自我批评，或对孙立平的批评推得太远。本评论的中心论点仍然是，新的趋同有其限度：“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三个世界”依然存在。

虽然有国企的私有化和跨国资本的大量流入，“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珍稀，但仍然存在。不过，共产党仍旧垄断着政治权力；国家仍旧是发展导向的；传统儒家的等级与和谐观念看上去和平共处，并与自由民主的观念在竞争。关于儒家和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各种观点，请参阅 Eisenstadt, 1991; Guo, 2003; Yao, 2002)。

俄罗斯现在市场制度已经相当成熟，但社会

关系仍旧有较多的世袭家长制色彩，虽然这些关系并不因此表明这个社会受专制统治者支配，至少一些评论家相信，在一个东正教崇拜权威的影响根深蒂固的民众中，这些色彩被深深印刻在社会关系上了。^④

由于成为欧盟成员，中欧国家与我们所知道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最接近，并明显倾向于新自由主义。这些国家对跨国资本的依存度很高，有些采取了对企业非常优惠的政策。比如，爱沙尼亚、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采取了单一税率，其它国家也在认真考虑采取这种税制；O'Dwyer, 2007)，并正滑向英美的而不是欧洲的社会模式。^⑤

阶级斗争和精英冲突

有没有从社会主义转型的中国道路呢？简单的回答是有，但从最近十年的发展来看，它越来越不再是“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而是越来越指向国家资本主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孙立平所倡导的很有吸引力的实践社会学和对普通民众的强调？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先要把这个问题变成我自己的语言，并讨论做为历史动力的阶级和精英斗争。马克思认为历史是通过阶级斗争自下而上推动的。韦伯则认为历史运动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是不同精英派别之间斗争的结果。孰是孰非？我的答案是这取决于当时当地的历史情势。

毫无疑问，自下而上的过程——用我的术语来说：阶级斗争——在中国改革的第一阶段是关键性的。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阶级斗争在中欧和东欧国家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参阅 Szelenyi, 1988）。邓小平的早期改革，很像1968年后匈牙利卡达尔政权的改革，是一个分裂的统治阶级向农民/农民工的妥协，为的是换取政治上的和平。1986年，我为我的《社会主义企业家》写导言时——该书分析了一个新的有产的小资产阶级的

兴起——我讨论了“自下而上的、静悄悄的革命。”让我引用我自己：“本书强调农村半无产阶级……在追求他们经济独立和公民权的目标时所做的……重大贡献。社会学家卑微的任务是……充当这一历史的见证，并录下这一波安静的革命中的各种事件”（Szelenyi, 1988: 22）。还有：“匈牙利的农民，以及远离他们半个地球的中国的兄弟姐妹们数十年来耐心地教育他们的新主人：……如果允许人民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农业——当然社会也一样——会变得更好”（Szelenyi, 1988: xv）。我相信这与孙立平倡导的实践社会学所说的“普通民众采取的策略”是相同的观点。

然而，1989年以后不久，我就认识到，至少匈牙利转型的最大输家之一就是普通大众。休克疗法和取消进口和物价管制消灭了“社会主义企业家”，即那些在所谓的第二经济中开始获得社会和经济自主权的一群人。受到来自西欧农民的没有限制的竞争，产出的价格下降，而由于对燃料和化肥取消管制，投入的价格则急速上升。在农业部门中，转型的受益人是前合作社的经理们。同样的趋势在经济的其它部门也可以看到。1989年变成了“自上而下的革命”，大众阶级没有得到动员，精英之间的斗争推动着转型。

匈牙利并不是例外，欧洲其它前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基本相似。最令人迷惑的案例是波兰。1981年波兰工人阶级的动员水平在世界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第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眼看就要发生，而它所反对的，则是一个自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是到了1990年，团结工会政府什么都是，就是不是无产阶级的。虽然一些前工人，如瓦文萨，仍旧发挥着某些政治影响，这个国家却是由一些技术官僚统治着，他们中有些来自于支持团结工会的知识分子圈子，有些则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和党的机构。后者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这些政策几乎不考虑普通民众的利益。尽管

生活水平下降，就业率上升，社会保持沉默。没有像1981年在格但斯克那样，暴发罢工和抗议，第一次民主选举的投票率低得令人沮丧。

如果我们要理解为何社会主义在欧洲解体，以及后社会主义国家各不相同的转变方向，我们就必须仔细考察在社会等级的顶端发生了什么。在1991年的俄罗斯，官僚权力实际上并没有被削弱。戈尔巴乔夫试图把权力从共产党统治阶级中的官僚集团——技术官僚——手中转移出来，但他失败了。俄罗斯的权势精英成功地把他们的政治特权转化为私人财富。与此相对照，中欧官僚集团的权力是逐渐瓦解的，到1989年，前权势精英中的技术官僚群和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结盟赢得了政治权力。这个新的后社会主义权力集团联合起来反对官僚集团，形成了对私人攫取公共财富的主要障碍。前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是道德的守夜人。他们的同盟，前共产党的技术官僚，通常是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和工程师，他们知道为了使经济有效运转，企业需要拥有资本和世界市场地位的新主人。这些“更聪明的”中欧技术官僚甚至没有试图去“盗窃”公共财产。相反，他们把自己管理的企业出售给与他们有关系的、信誉良好的西方商业伙伴，以换取经理职位。

那么，普通民众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有作用吗？在东欧和中欧版本的“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中恐怕没有太大的作用。后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是“专家们”按着芝加哥经济学的菜谱烹调的，很少考虑普通民众的需要和口味。根据 Jeffrey Sachs 自己的说法，他在某一夜的十一点至第二天凌晨的几点之间，草拟了关于波兰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15页计划（Sachs, 2005: 111-17）。虽然他很聪明，但他肯定没有关于波兰或社会主义一般经济状况的专业知识——这是典型的设计出来的和照搬菜谱的资本主义，它对受其影响之人民的经验和实践毫无所知。

我的《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在当时是对我十年前的《社会主义企业家》一书中观点的一个自我批评。我不得不承认,我先前描述的自下而上的静悄悄的革命失败了:在前社会主义欧洲变化是自上而下的。但我那时仍相信中国是不同的:中国仍旧是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由于城市公共部门的私有化,跨国资本的影响日益增长,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今天的中国与十年、二十年前相比,已经越来越不像是自下而上的了。虽然中国的资本主义会保留一些中国特色,但后社会主义转型路径之间的差距看来在缩小,在所有转型社会中,行动似乎都发生在社会等级的顶端。

普通民众的实践是重要的,但多重要:比它曾经有过的多还是少?——这是一个要由仔细的实证研究来回答的问题,而不应该当作一个认识论的假定。

参考文献:

- BRUGGER, WILLIAM(1976) *Democracy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 (1948- 195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RAWOY, MICHAEL(1996) "The state and economic involution: Russia through the Chinese lens." *World Development* 24, 6: 16- 38.
- (2001a) "Transition without transformation: Russia's involutory road to capitalism."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15, 2: 269- 92.
- (2001b) "Neo- classical sociology." *American J. of Sociology* 106, 4: 1099- 1120.
- BURAWOY, MICHAEL and PAVEL KROTOV (1992) "The Soviet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to capitalism: worker control and economic bargaining." *American Sociological R.* 57, 1: 16- 38.
- COATES, DAVID (2000) *Modes of Capitalism*. London:

Polity Press

- EISENSTADT, SHMUEL (1991) "Some observ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ism, development and modernization." Pp. 360- 66 in Silke Krieger and Rolf Trauzettel(eds.), *Confucianism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Mains: v. Hase and Koehler Verlag.
- ESPING- ANDERSEN, GÜSTA (1990)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 EYAL, GIL, IVAN SZELENYI, and ELEANOR TOWNSLEY (1998)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London: Verso
- (2001) "The utopia of post- socialist theory and the ironic view of history of neo- classical sociology." *American J. of Sociology* 106, 4: 1121- 28.
- (2003) "On irony: an invitation to neo- classical sociology." *Thesis Eleven* 73: 5- 41.
- GARCELON, MARC (2005) *Revolutionary Passage: From Soviet to Post- Soviet Russi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 Press.
- GUO, XIAOQIN (2003)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s Democratic Transition: Confucianism, Lenin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Routledge.
- GUSTAFSON, THANE(1999) *Capitalism Russian Sty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 HALL, PETER and S. SOSKICE [eds.](2002)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 KING, LAWRENCE P. (2000)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ransition." *European J. of Sociology* 41, 2: 189- 224.
- KING, LAWRENCE and IVAN SZELENYI(2005) "The new capitalism of Eastern Europe." In Neil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eds.),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 (2006) "Max Weber's theory of capitalism and varieties of post- communist capitalisms." *Angewandte Sozialforschung* 24, 3- 4: 175- 85.
- KORNAI, JANOS (1994) "Transformational recession:

the main causes." *J.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 1: 39-63.

NEE, VICTOR (1989)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 54, 5: 663-81.

——(1992)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of market transition: hybrid forms, property rights, and mixed economy in China."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 37: 1-27.

O'DWYER, CONOR and BRANISLAV KOVALCIK (2007) "And the last shall be first: party system and second-generation economic reform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41, 4: 3-26.

OL, JEAN(1999) "Two decades of rural reform in China: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China Q.* 159: 616-29.

RONA-TAS, AKOS (1994) "The first shall be the last?" *American J. of Sociology* 100, 1: 4-69.

SACHS, JEFFREY(2005) *The End of Poverty*. London: Penguin.

SZALAI, ERZSÉBET (2006) *Az újkapitalizmus (Neocapitalism)*. Budapest: UMK.

SZELENYI, IVAN(1988) *Socialist Entrepreneur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SZELENYI, IVAN and ERIC KOSTELLO (1996) "The market transition debate." *American J. of Sociology* 101, 4: 1082-96.

WALDER, ANDREW(1996) "Market and inequal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American J. of Sociology* 101, 4: 1060-73.

——(2003) "Elite opportun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 88: 899-916.

WOODRUFF, DAVID (1999) *Money Unmade*. Ithaca, NY: Cornell Univ. Press.

YAO, SOUCHOU (2002) *Confucian Capitalism: Discourse, Practice and the Myth of Chinese Enterprise*. London: Routledge.

注释:

①对前南斯拉夫、波罗的海国家和巴尔干国家如何定位存在争议。不过,由于它们加入了欧盟,它们正从东欧国家转变为中欧国家。

②1989~1990中国的年增长率下跌到4%左右,但从1991年起一直接近10%,有时更高。参见 www.chinbil-ity.com/gdp。

③我的转型理论比较资本主义理论,我亦称其为新古典社会学;参见 Eyal et al., 2001) 是打算为“资本主义的多样性”(the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的文献(Esping-Andersen, 1990; Coates, 2000; Hall and Soskice, 2002) 做出一个贡献。它在其他学者所认定的不同形态的资本主义之外,增加了后共产主义的形式。

④一个俄罗斯的思想库,社会工程研究所,在2004年11~12月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73%的受访者告诉调查者他们最相信俄罗斯联邦总统。第二个最受信任的制度是教会(59%),接着是军队(50%)。最不受信任的制度是国会,政党,和媒体。此外,大多数受访者被问及在自由和平等之间选择何者时,都选择平等。当然,这些态度是出于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怀旧,还是因为东正教尊重秩序和权威的价值的复兴,是可以讨论的。

⑤社会福利制度在后社会主义社会中是最后被改革的;在中欧也一样。但是做为欧盟新成员,它们被欧盟要求平衡预算,并使它们的福利待遇市场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似乎在向英美的养老金,医疗服务,高等教育制度靠拢,而不是采用欧洲的社会模式,尽管欧盟对其做了大量的意识形态承诺。

(译/刘 昶)

Ivan Szelenyi: 耶鲁大学社会学 William Graham Sumner 讲座教授和政治学教授

责任编辑:吴莆田